

時 評

「中國農民調查」現象的評論

On “China’s Peasant Survey”

歐陽新宜 (Ou-Yang Hsin-Yi)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陳桂棣和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在2004年1月出版。他們從2000年10月開始，兩年時間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農村；又大規模的採訪了中央和地方「三農」研究者與政府官員，對中國的農民作了一次長期而深入的「田野調查」。或許是因為深入農村，對農民生活困苦實情報導的生動，對農村幹部橫征暴斂批判之翔實，以及對於農業制度改革的分析與期待，本書一出版就成為各界討論的話題，不僅在學界、新聞界蔚為風潮，甚至成為中共2004年農業政策辯論的主要焦點。一般認為兩位作者本於道德勇氣的良知良能，說出了大多數人「該說而沒有說」的真實。可是不旋踵，就在今年3月間，當人大、政協兩會開會期間，為免事端，這本「田野調查」的學術專書，卻又成為了當局管制銷售的禁書。可是網路上卻仍到處流傳，甚至整書文字還可用電子檔形式下載。到底，這本書是因為對三農困境講得太真，對農村幹部腐敗問題暴露得太多，對深化農村改革的政策太挑釁、對中共政權維繫不利？還是因為以管窺豹、局部放大、言過其實，渲染太過，對中國整體社會的穩定不利，才又受到中共當局的禁制？更有甚者，本書的出版、禁制與網路流傳，到底對於哪些政團有利，又對哪些對立政團有害，我們身處對岸，對於中國大陸的農民情勢，隨著一本調查報告的熱潮與禁制，又應該秉持如何的視角？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的農民問題一直嚴重。早年被毛澤東批評的舊時代三大矛盾：「工業與農業」、「都市與鄉村」、「勞心與勞力」，其實都與農民的困頓有關。如今，社會主義在市場化的潮流中變成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全國國民平均所得固然翻了幾番，城市居民的生活比市場化之前更是翻了幾十番，但是農民困頓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猶有甚之。毛澤東對於農村問題，在八十年前，當他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領袖時，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後來情勢

的發展與其調查結果符合，不僅使他成為中國農村問題分析專家，也成為掌握農民運動的導師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舵手。陳桂棣和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之所以成為目前熱門的議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這樣一個深入農村、「實地調查」，用20萬字寫出的一本書而爭取得來的「發言權」的地位。學界對於「發言權」大小的評估固然沒有一定的標準，可是用「中國農民調查」所作的 Google search 符合的網頁竟然高達37,300項，其議題影響力可見一般。一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聲譽背書的作品，其一禁一鬆之間的議題爆發力，更是不可小覷。

但是中國大陸農民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是一直嚴重、一樣嚴重、還是越來越嚴重？中國現在的農村的問題，根據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2000年給中共國務院的報告中，提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以致「三農」之說，甚囂塵上，更成為「黨的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可是，三農問題真的比十年前嚴重嗎？比「文革時期」還嚴重嗎？比「三年災害時期」還嚴重嗎？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寫「大地」時期還嚴重嗎？絕對的嚴重與相對剝奪感之間的評量，哪一個變項才具有農民問題的真正操作性定義的地位？中國大陸研究中太多次的議題設定，讓我們學到了對於真實的認定需要更多的客觀材料才能判定。譬如，當中共中央在90年代須要提升整體國家能力時，就宣稱「諸侯經濟」、「地方主義」盛行，甚至有「地方割據」的現象，以致於必須提升中央汲取財政的能力，壓制地方財力。會不會正是因為這樣，讓何開蔭在90年代初期就倡議的，對地方農村有利的「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以及「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如「土地永久承包」，如減輕農民負擔的「稅費改革什一稅」遭到了強力的打擊？

議題與真實的區別是社會科學界的常識，在中國研究的領域卻特別來得重要。前者，叫作「情勢分析」；後者，叫作「基礎研究」。一方面，基於理論、模式和客觀數據所呈現出來的科學知識，我們可以得出農民的絕對所得、絕對負擔、絕對受壓迫、絕對情緒發洩的客觀的水準。譬如，英國路透社對於中國大陸社會抗議事件的媒體分析，就是一例。和其他社會事件比較起來，中國大陸農村的社會抗議情緒，似乎也不比遼陽、大慶的下崗工人罷工事件來得更為嚴重？同樣的，中共社會科學院發表的客觀數據顯示，在1999年當工人失業成為熱門議題時，其實真正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卻被擱置，直到十六大召開之前才又被部分學者誇張的提起。對於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成長率與能源消耗率的不一致性，西方學者不也早就提出質疑嗎？中共農業問題的關鍵，從基礎研究的角度看起來，根本不是農民、不是農業，更不是人口問題，而是包括中共是學者何開蔭自己也結論的：稅費改革其實是有著豐富內涵的。它上連著農村戶籍制度、農村金融體

制和糧食購銷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連著農村基層財稅體制、財務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科技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最重要的鄉鎮村級機構的改革。總之，農村稅費改革是一場十分複雜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總的來說，就是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過渡間的矛盾。此一問題，牽一髮動全身，不僅關係中國大陸經濟是否繼續發展的全局，更可能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衝撞的火線。這樣的問題恐怕不是溫家寶：「共產黨人一定能走出黃宗義定律的怪圈」一句話就能解決得了的。

從田野調查的角度來看，本書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展示了與史學在方法論上的共通性，那就是：「秉筆直書」。一般大陸學者討論此書時，也用了這樣的評價標準。在此書不畏強勢的「秉筆直書」中，在字裡行間強烈被感受到的訊息，有：苛捐雜稅過重、城鄉差距過大、「幹群關係」惡劣、農村制度改革力度不夠。其中，似乎也透露出新的「稅費改革」正在上路的期待。故事的真實性讀來生趣感動，是一篇好的文學作品。不過，以「三農」為經，以人物故事為緯的報告文學距離社會科學的「質化研究」，仍有方法論上的討論餘地。因為，質化研究中的「社會顯著性」調查原則，是不允許事先以「三農問題」中的苛捐雜稅過重、城鄉差距過大、「幹群關係緊張」作為前提的。這就好像一部設定「暴政必亡」為議題的「秦始皇」報告文學，無論其如何不畏強勢、「秉筆直書」，也不會得出「英雄」的結論來是一樣的。

無論如何，中國大陸的權威出版社能夠出版這樣一部「秉筆直書」的文學作品，毋寧是一種知識與道德上的進步。因為大膽、良心、「秉筆直書」而能產生轟動、感佩與慚愧，其事是彰顯了大陸學界與新聞媒體界過去的敷衍、苟且和「曲筆」；同時，道德良心的讚美不正也凸顯了大陸官場無論中央與地方長期對於農業問題的腐敗與壓制？至於為什麼此時此刻能夠出版，是否有新的「稅費改革」、「土地產權制度」、「整肅地方貪官」與「彰顯中央新氣象」的議題設定出臺？除此之外，加入WTO之後，中國三農問題的變化，本應才是重要的基礎研究；其對中共政治生態的影響更是重要的情勢分析，倒是值得大陸情勢觀察者的注意。

最後一個感想則是：如果本書作者陳桂棣，以安徽合肥市作協主席、國家一級作家，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身分在作三農調查時都會被人跟監，甚至受到威脅，那麼非大陸的外地人到大陸農村作田野調查，將會得到什麼真實的結果？如果本書作者以道德勇氣秉筆直書地作了非官方式的報導，而讓大陸新聞人與作家感到自形慚愧與墮落，那麼「這塊、那塊」不離口，隨大陸官方文件議題起舞的非大陸外地產官學界，又將會有什麼樣的反省與感想？